

热的雪

〔苏〕尤里·邦达列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热 的 雪

〔苏〕尤里·邦达列夫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热的雪》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

Горячий Снег

«Роман Газета» № 4—5, 1970

Москва

根据《小说月报》1970年4—5期译出

热 的 雪

〔苏〕尤里·邦达列夫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热的雪》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125 字数 331,000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418 定价: 1.05元

内 部 发 行

在“新的解释”背后

——简评《热的雪》

任 敏 文

苏修作家尤里·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热的雪》，是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这篇东西在一九七〇年的《旗》杂志发表以后，就博得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赞赏。苏修评论界把它吹捧为“文坛上引人瞩目的作品”，“战争文学三部优秀作品之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颂歌”等等，还说他“对战争中的许多问题作了新的解释”。

邦达列夫，此人生于一九二四年，在苏联卫国战争的年代里，曾经当过一名炮兵指挥员。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写作。他写过《步兵营要求炮火支援》（一九五七年），《最后的排炮》（一九五九年）等中长篇小说。他由于大写战争文学而受到苏修叛徒集团的宠爱，现在他是所谓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的一名书记。在一九七五年，邦达列夫又炮制出了另一部战争小说《岸》。

近几年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适应他们的

全面扩军备战、对外侵略扩张和争霸世界的政治路线需要，就加紧利用文艺作品，煽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宣扬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这种宣传真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最无耻的是，他们竟然借回忆打败希特勒法西斯匪帮、歌颂卫国战争的胜利来为他们的侵略扩张政策辩护。他们在卫国战争和他们今天的侵略扩张活动之间，极其厚颜无耻地划上了一个等号。甚至有人还叫嚷什么卫国战争至今还没有结束。例如，有一个叫瓦吉姆·索布可的苏修御用文人，他在一九七四年的《十月》杂志上发表了一部篇名为《利霍鲍尔》的长篇小说，他在全书的结尾中写道：“路卡握着马伊奥拉的手，仿佛要在这一场还没有结束的战争中，保卫他的女朋友，因为到今天为止，胜利的取得虽然大约快三十年了，但是在什么地方，还有士兵在倒下。”

苏修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文学报》在一九七五年曾经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写战争”为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热的雪》作者邦达列夫在会上这样说：“如果我们把战争仅仅作为世界上过去的事件来写，我们就不是艺术家而成了历史家了……我们的思想要象指南针那样永远指着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的唯一名称是：当代。”

既然如此，这就很清楚：《热的雪》写的虽然是三十年前的卫国战争，但是它所指的目标却是“当代”，它就

是为了配合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反革命的政治需要而炮制出来的。

《热的雪》写的是一九四二年冬季在斯大林格勒西南草原上的一场阻击战。当时苏德战场的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红军转入反攻，德军保罗斯第六集团军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成了瓮中之鳖。希特勒为了解救被围的军队，便纠集了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命令他们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击。这时，红军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从后方抽出一个新编集团军，赶到离斯大林格勒四十余公里的一条河边迎击德军。小说的主要情节就从这里开始。作者着重描写集团军所属一个炮兵连的作战活动。战斗打响后，德军四百辆坦克强攻渡口阵地，炮兵连首当其冲，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一门炮和几个人。但激烈的战斗使敌人耗尽了全部预备队，这时，集团军司令便动用两支生力军发起反击，于是战场形势大变，红军转败为胜，故事就到此结束。

邦达列夫在小说中着重描写了炮兵连的核心人物，排长库兹涅佐夫同连长德罗兹多夫斯基之间的斗争，也着重写了高级指挥员，集团军司令员别宋诺夫、集团军军事委员维斯宁与斯大林派来监督集团军作战的欧辛上校之间的冲突。库兹涅佐夫和别宋诺夫就是邦达列夫为了配合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侵略扩张活动从卫国战争的历史中找来，作为教育今天的炮灰们用的

两个“理想人物”。

邦达列夫是主张把小说中的主人公放在所谓紧张复杂的环境中加以考验的。他在那次谈战争文学的座谈会上讲过，“我所关心的是人们在决定性的情势中极度紧张时刻的行为”。《热的雪》中的那些人物，就是按照这个处方来配制的。

库兹涅佐夫无疑是作者心爱的人物，是作者理想中的青年军人。作者竭力宣扬库兹涅佐夫的所谓“人道精神”，着力描写他如何“人道”地对待周围的事物。曾经在德国法西斯匪军俘虏营待过的炮兵戚比索夫，胆小如鼠，打起仗来总是缩在后头，——但是库兹涅佐夫却对他又是怜悯，又是照顾。在赶到堵截阵地的行军途中，走得一瘸一拐的戚比索夫，把背包和卡宾枪放在车上。连长德罗兹多夫斯基生气地命令大家必须在五分钟之内把东西拿走。当库兹涅佐夫知道其中有戚比索夫的一份时，非但不加呵斥，反而放低声音问他，“累了吗？”库兹涅佐夫在这次行军途中还对一匹不胜重负倒在地上的马也大动恻隐之心，他觉得枪毙一匹受伤的马，“就象对弱者残酷地执行枪决似的”。后来，他们开进了阵地，法西斯飞机就来轰炸，库兹涅佐夫本想下命令叫别人跳出壕沟，把瞄准镜卸下来，可是他觉得自己无权来利用排长的权力强迫别人冒着轰炸的危险跳出战壕去。一句话，库兹涅佐夫的心肠真是软得

连菩萨都要自叹勿如。

可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把库兹涅佐夫写得非常“勇敢”。说他在打第一仗的时候，就非常能够“沉住气”。敌人的坦克已经开得很近了，连长德罗兹多夫斯基接连打电话来，命令他开炮，他毫不理会，反而反唇相讥道：“向哪儿射击？对着烟雾打吗？提前暴露我们的炮连吗？”激战结束，敌人坦克的主力渡过河冲到北岸去了，库兹涅佐夫的炮班只剩下四个人和一门炮，他们被撂在后边，跟大部队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但是，作者描写他仍旧在阵地上“坚持”。他跑到已经被压毁的其他炮兵阵地上搜寻炮弹，在掩蔽部照顾伤员。后来，有一个事先派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兵冲破敌人的拦截逃到他们的阵地，库兹涅佐夫从这个已受重伤的侦察兵口里知道，前面五百米，弹坑里还有两个侦察兵，他们还带着一个重要的德国俘虏。库兹涅佐夫不顾前面是一片开阔地，还有德国人的埋葬队在活动，随时都会遭到枪击，还是带着两个伙伴，设法跑到那里，把侦察兵救了回来，同时也把那个后来提供了重要情报的德国俘虏安然地押送了回来……

但是，邦达列夫所竭力吹嘘的库兹涅佐夫的“人道精神”，“勇敢精神”，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是出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是出于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忠诚？——完全不是。在邦

达列夫的笔下，“勇敢”只是一种“病态的狂热”，一种“破坏欲”，一种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作者这样描写库兹涅佐夫在炽烈的战斗时刻的精神状态道，他“仿佛昏昏沉沉地越过了某种境界，进入了一种从前不曾有过的心理状态：他不自觉地沉醉于仇恨和破坏的狂热中，当他对德国人的坦克开炮并看到它们中弹起火时，支配着他的就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在另一处，作者又这样写道：当“火热的气浪一阵阵冲击到脸上来时”，库兹涅佐夫的“发聋的耳朵里尽是枪炮的嗡鸣，——这一切使他不由得怒火万丈，产生了强烈的破坏欲”。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库兹涅佐夫所以“怒火万丈”，不是由于对法西斯强盗的侵略罪行感到无比的愤怒，而是因为“火热的气浪”冲上脸来，耳朵里尽是“枪炮的嗡鸣”。这种“仇恨心”、“破坏欲”与当年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中所表现的誓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英勇精神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然而这正是今天社会法西斯主义所需要的货色。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就需要这种样子的“理想人物”：他们一手摇着“人道主义”的橄榄枝，另一手挥舞着“霸权主义”的刀剑，带着“病态的狂热”、“强烈的破坏欲”，横冲直撞地闯到别人的国土上去，就需要这种能够贯彻他们的侵略意图的雇佣军式的人物。苏修评论界所以把库兹涅佐夫捧为“具有崇高的人性”的“英雄人物”，道理就在这里。

连长德罗兹多夫斯基是作为库兹涅佐夫的对立面而出场的。在邦达列夫的笔下，他是一个“刚愎自用”、“蛮横无礼”的人物。在战斗十分危急的时候，他自己蹲在胸墙下面，却要那个驭手舍尔古宁柯夫拿了两颗手榴弹，跑过一百五十米的没有遮掩的开阔地，去炸毁德方的自行火炮，舍尔古宁柯夫在半道上就被机枪扫倒了。后来，又由于他的固执和错误的指挥，迫使女卫生指导员卓娅作了无谓的牺牲。可是当卓娅已经身负重伤的时候，德罗兹多夫斯基自己仅仅是“擦破了一块皮”，他却赖在地上不肯起来，丧魂落魄地高叫：“卓娅在哪儿？……我负伤了，让她来给我包扎！”——总之，德罗兹多夫斯基的一举一动处处和库兹涅佐夫形成强烈的对照。他在指挥作战上经常和库兹涅佐夫发生冲突。在小说中，他由于不能象库兹涅佐夫那样既善于使用软的一手，又缺乏硬的一手，不能给今天为苏修叛徒集团侵略政策卖命效劳的炮灰们作榜样而大受奚落。

邦达列夫一方面竭力美化库兹涅佐夫，一方面又用大量的篇幅吹捧高级指挥员别宋诺夫的形象。别宋诺夫就是派来堵击德军的这个新编集团军的司令员。作者描写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态度严厉，对各种事情都“力求有自己的观点”。作者特地用了一章的文字专门描写斯大林召见他的情况。据说，尽管当时别宋诺夫

的腿伤还没有全好，还得撑着手杖一瘸一瘸地走路，但是斯大林却是已经迫不及待地请他“出山”，而且还跟别宋诺夫讨论了战争的前途。在到了战场以后，别宋诺夫也不象别的司令员那样总是待在指挥所里，而是经常深入到前方阵地。当另一个集团军所属的坦克由于惊慌失措退却下来的时候，别宋诺夫就命令把坦克分队长叫来见他。那个分队长起先不相信竟会有将军在场，大发脾气说：“见什么将军？……将军跟步兵一起行军吗？那么谁待在司令部呢？”邦达列夫更特别强调别宋诺夫在指挥作战时的“沉着”态度。他说，尽管前方情况十分紧急，敌人的大批坦克已经渡过河到北岸来了，集团军所属的杰耶夫师的一个团的联络已被切断，但是别宋诺夫还是顶住了，没有把他原定作为反击力量的坦克军和摩托化军“分散成一个个的旅”调上去增援，而是严厉地命令：“各条防线务必坚守到最后一个人。无论是谁，都不准离开阵地，”一直等到证实敌人的力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才把生力军投入反攻，这样，终于取得了胜利。总之，邦达列夫把这一场使集团军由伤亡惨重、濒于全军覆没到转败为胜的功劳都归于别宋诺夫的“指挥有方”。

然而这样的描写是对历史真实的最无耻的歪曲。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次规模十分巨大的战役。别宋诺夫集团军所参加的战斗，不过是整

个巨大战役的一小部分。如果没有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对作战方案作仔细详尽的研究,并对战争全局进行正确的指挥,光靠别宋诺夫之流的孤军作战,是决不能打败法西斯军队的。就是邦达列夫也不得不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人物的口承认,战局的转变,“跟友邻部队在顿河中游的行动,跟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什方面军的行动有关”。可见,邦达列夫把阻击战的胜利归功于别宋诺夫是完全缺乏事实根据的。

邦达列夫不仅是通过夸大别宋诺夫之流的个人作用来歪曲历史,他还借描写别宋诺夫的生平,用隐晦曲折的手法攻击了斯大林。最恶毒的是,邦达列夫竟然把负责指挥这次阻击战的三个高级军官——从方面军司令员到集团军司令员别宋诺夫和集团军军事委员维克斯宁,都写成是所谓斯大林肃反政策的“受害者”。方面军司令员曾在三十年代被苏联专政机关逮捕过,集团军军事委员则因为与反革命案件有牵连而受过严厉警告。而别宋诺夫呢,虽然他是斯大林亲自把他从军事学院叫到克里姆林宫,任命他为集团军司令员的,——然而邦达列夫却别有用心地描写说,斯大林实际上对他并不信任。别宋诺夫的儿子维克多所在的第二突击集团军打了败仗,司令员弗拉索夫投降当了俘虏,维克多自己也被俘了。斯大林跟别宋诺夫谈话时

特别提到了弗拉索夫的背叛事件。尽管斯大林安慰别宋诺夫说：“我不是指您儿子的命运”，“我们不把他列入被俘人员名单，而把他作为下落不明的人”，——但是别宋诺夫后来在集团军里的一举一动，却都是在集团军反谍处处长欧辛上校监视之中的。当别宋诺夫偕同维斯宁来到杰耶夫师观察所后不久，欧辛就急急忙忙跟踪前来，转弯抹角地对军事委员维斯宁说，“最好您和司令目前能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指挥战斗”，他生怕万一敌人冲过来，司令员和军事委员都变成德寇的俘虏，做了弗拉索夫第二。后来，维斯宁奉别宋诺夫之命回到坦克军那里去就地指挥，一路就由欧辛上校伴送回去。在快到达目的地时，却和敌人的坦克遭遇上了，司机急忙减低车速，但是欧辛不相信这里会有德国人，逼着司机加大油门，继续把车开过去，这样终于遭到德军的伏击。维斯宁由于欧辛的缘故而作了无谓的牺牲。

邦达列夫把方面军和集团军的领导人员都描写成为肃反的“受害者”，竭力渲染苏联最高统帅部同部队高级指挥员之间的互相猜忌，互不信任，——这种写法是对苏联人民、苏联红军莫大的污辱。斯大林是苏联红军的统帅和组织者。他在卫国战争中不仅紧紧依靠在革命战争中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高级指挥员，而且还不断提拔许多有实际战斗经验的新的人员充实部队的领导。红军所以能够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全歼敌军，

是与当时斯大林正确掌握军队方面的干部政策分不开的。如果象邦达列夫所设计的那样，军队指挥系统上下离心，互相猜忌，必须经常派遣特工人员监督，才能作战，——那么，别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打不赢，更小的战斗也一定打不赢的。何况，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由于进行了肃反，打击和镇压了那些与帝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有勾结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党内外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得以顺利地进行，才为卫国战争打下思想基础与物质基础。希特勒在发动这次背信弃义的进攻时，一心指望能够在苏联内部找到代理人，企图里应外合，但结果这种“指望”落空了，这就从反面证明了肃反的必要性，证明了当时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再说，希特勒所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规模是空前巨大的，而且又是不宣而战，搞突然袭击。在战争初期的苏军方面，未必现现成成就有几个能够完全掌握击败法西斯军队、稳操胜算的规律的将军。战争中必然出现许多料不到的问题。不论老一辈的将领，新一代的指挥，只有经过艰苦作战过程的反复锻炼，才可能真正掌握善于同敌人作战的方法和规律。这也就是说，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但邦达列夫在小说里却把别宋诺夫写成一个什么条件都已齐备的神乎其神的人物，这是没有现实根据的。因为，根据邦

达列夫的描写，在实际上，别宋诺夫原不过是在军事学院教教书的。后来虽然参加过莫斯科战役，但马上就受了伤，——所以，他也并没有经历过漫长时期的战争考验。邦达列夫如此抬高别宋诺夫，无非是要一笔抹煞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绩，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党篡政找出历史根据而已。

总之，邦达列夫这本《热的雪》，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无论通过哪一个主要人物来解剖，它都是一株浸透毒汁的大毒草。邦达列夫写的是反法西斯战争，可“指着”的“目标”却是“当代”。《热的雪》的要害问题，就是妄图抹煞当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与苏修今天对外的侵略扩张活动的根本不同性质，妄图抹煞苏修叛徒集团和苏联人民的阶级对立，而在所谓“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旗号下，借所谓“纪念卫国战争”，煽起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宣扬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

今天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既然篡夺了苏联的党政领导大权，苏联已经完全蜕变成为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前提下，邦达列夫鼓吹什

么“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无非就是妄图蒙蔽苏联人民去“爱”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去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充当炮灰。

苏修论客们叫嚷什么邦达列夫“对战争中的许多问题作了新的解释”，——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在“新的解释”的幌子后面，邦达列夫宣扬的是希特勒法西斯的强盗逻辑！

第 一 章

库兹涅佐夫睡不着。车厢顶上的呼啸声一阵紧似一阵，狂风暴雪袭击着车厢，铺位上方隐约可见的小窗给越来越厚的积雪遮没了。

机车发出凶猛的、撕碎风雪的怒吼，拖着军用列车在夜色沉沉的原野上、在白茫茫的漫天飞雪中疾驰。在轰隆作响的车厢的昏暗中，在车轮磨擦冰雪的尖叫声里，在士兵们从梦中发出的惊恐的呜咽声和喃喃呓语中，可以听到这仿佛在不断给谁发着警告的机车的怒吼声。库兹涅佐夫透过暴风雪，似乎看到前方有一座燃烧着的城市在冒着朦胧的火光。

在萨拉托夫停车之后，大家算是弄清楚了：现在要把他们的师紧急调往斯大林格勒附近，而不是象他们最初推测的那样调往西线。此刻库兹涅佐夫也知道，只有几小时的路程了。于是他把粗硬刺人的、被呼吸弄潮了的军大衣领子拉到面颊上，但怎么也暖和不了，仍然睡不着，因为寒风从积雪掩盖的小窗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缝隙里钻进来，尖厉的过堂风在铺位之间穿来穿去。

库兹涅佐夫冷得蜷缩成一团，他想：“这么说，我要很久看不到妈妈了，火车已经开过了……”

过去的一切——那炎热多灰的阿克丘宾斯克城，炮兵学